

文献与时代：嘉庆《万载高村李氏谱（东房）》纂修考略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罗艳春

一 前言

任何文献都有其时代性。这里所说的时代性，一方面表现为单一文献的版本，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某一类文献集中纂修于某一时期。以地方志为例，明清时期是中国地方志纂修的高峰时期，单独一部县志的前后历次纂修，多者有达十余次者。另一方面，就方志这种文献类别来说，其修撰的时间又是比较集中的，清代方志大多集中在康熙、乾隆、道光以及同治、光绪几个时期（参见表一）。修志集中于特定的时段，表明竞相修志已然成为一时的风气，体现出具有“大历史”意义的时代性特点。^①这种文献的时代性，也同样反映在明清以来的族谱纂修中。江西万载县清代以来纂修的族谱，截至2006年散见于公共图书馆的就有270种。^②根据笔者对万载族谱谱序编年的粗略统计，总共358次的纂修，清中叶以及清末和民国时期是族谱编纂比较集中的时期（参见表二）。梁洪生对辛亥前后江西族谱反映出的社会变迁的研究，充分体现了清末民初时期所修族谱的时代性。^③本文以江西万载县高村山湾李氏宗族纂修的族谱为例，结合文献产生的地域场景和地方社会历史脉络，力图揭示出族谱文献与时代大历史之间的关系。

表1 清代江西及全国方志纂修情况统计

区域 \ 时代	顺治	康熙	雍正	乾隆	嘉庆	道光	咸丰	同治	光绪	宣统
万载 (10) [1]	/	1	1	/	/	2	1	1	/	/
江西 (395) [2]	6	106	5	84	11	74	5	85	19	0
全国 (4655) [3]	171	1286	149	1024	294	413	77	335	751	65

说明[1]万载县目前存世的县志版本有：康熙二十二年版、雍正十一年版、道光十二年版、道光二十九年版（《万载县土著志》）、咸丰十年版（《万载县志摘要》）、同治十年版以及民国二十九年版七种，另外还有明成化十二年、嘉靖二十二年、崇祯九年的修志序言。

[2]江西及万载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华书局，1986。

[3]全国数据统计来源于林天蔚：《地方文献研究与分论》的“清代地方志分类统计表”，北京图书出版社2006，第40-41页。林天蔚的统计数据中还包括年代未详者90种。

^①笔者已就此先后撰写《文献与时代：道光〈江西通志〉纂修考述》（提交2009年9月26-27日在香港科技大学举行的“重构地方社会：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社会”研讨会论文）与《奉檄修志：道光时期江西县志的纂修与地方社会》（未刊稿）二文。

^②具体统计参见笔者《祠堂、宗族与地域社会：以16世纪以来的江西万载为中心》（2007年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的附录。当时的数据来源主要是上海图书馆、国家图书馆、江西省图书馆、万载县图书馆，2007年以后，笔者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广东省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天津市图书馆等公共图书馆，以及在过去一年多的田野考察中，又查询提阅了近百种万载族谱。

^③梁洪生：《辛亥前后江西谱论与社会变迁——读谱笔记三则》，《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2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

表 2 明清至民国时期江西省万载县族谱纂修情况抽样统计

洪武	宣德	正统	弘治	正德	嘉靖	隆庆	万历	天启	崇祯	顺治
1	1	1	2	2	6	1	3	1	4	1
康熙	雍正	乾隆	嘉庆	道光	咸丰	同治	光绪	宣统	民国	总计
14	6	56	36	44	18	29	58	4	69	358

说明：纂修情况的数据，系综合现存万载族谱中 93 种族谱的新旧谱序、谱跋及历次修谱名单，依次编年统计得出的。族谱存留情况请参考笔者博士论文《祠堂、宗族与地域社会》附录一。

高村位于万载县的西北部，与新昌（今宜丰）、义宁的铜鼓（今铜鼓县）以及湖南的浏阳县接壤。因为其地处两省（湘赣）三郡（袁州、南昌、长沙）之交，所以在明末清初的社会动荡时期，多次寇乱均以此地为巢穴。居住于高村山湾一带的是李氏宗族，现存与之相关的族谱及家族文献，公藏的有江西省图书馆馆藏嘉庆二年（1797）《高村李氏东房谱》、光绪三十二年（1906）《高村李氏和房祠主册》，以及由包括高村李氏在内万载十七支李氏合修的嘉庆二年《万载李谱提要》、同治十年（1871）《安仁坊李大祠神主册》和民国十一年（1922）《安仁坊李大祠神主田册》。^①山湾李氏后人保管的光绪三十二年《高村李氏谱（东房）》则是目前所见最为完整的一部，共有 8 册，除卷首、卷尾之外，分为高、曾、祖、父、身、子、孙、曾、元九目，其中两个曾卷又各有两卷。在光绪谱之前，高村李氏还曾经在同治十二年（1873）续修过一次，但究其内容以及编排体例，都是以嘉庆二年的初修谱为底本的。因此，嘉庆谱无疑是有关高村李氏宗族的一份重要文献。鉴于目前存留的嘉庆二年东房谱是一份残本，所以本文主要使用的材料仍然还是光绪版的《高村李氏谱（东房）》（以下简称光绪谱）。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其编纂过程，可以从中梳理出高村李氏族谱编纂的三个非常明晰的历史过程：康熙后期的谱牒、乾隆中期的发凡，以及嘉庆初年的族谱。每一个历史过程，都记录了高村李氏宗族的一个发展阶段，同时也反映了地域社会乃至整个中国的大历史背景。

二 康熙谱牒与明末清初的高村李氏

嘉庆初元，当清代万载县第一位进士李荣陞（1727-1800）准备着手全面整理高村李氏的谱系事迹时，可以作为直接参考的，就是他的祖父李菁（1654-1737，字英文）所辑的老谱。老谱内容不多，大体上包括祖先世系的记载，以及绘有祖先坟山的谱图，李荣陞将这些老谱称为“谱牒”，光绪族谱的主修者则称老谱为“旧牒”。^②

出于其本人于考据的兴趣与素养，李荣陞也对英文公谱牒进行了逐一考证修正，首当其冲的就是谱牒之序：

本家李氏原出西山忠武郡王之后，宋朝时始祖元衡公从上高县石牛渡坪埠分至万载二十四都二图高村里山湾立籍。先朝同修族谱，兵燹之后合族逃散，族谱俱失，故未有昭穆，今略录根枝留传于后。但高邨无阳基阴地，故累代单传不能发丁，后日子孙有能立志另择仁里迁居，更传世代，必要修阴积德，天道报应自获螽斯瓜瓞之兆矣。（宋原误作唐，仁里原作地理。此大

^①可参考梁洪生编著：《江西公藏谱牒目录提要》，第 082 至 086 号，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 年。

^②“我李东房之有谱牒也，大高祖奠基公因赠公英文府君旧牒，搜罗咨询，不惮再三，至嘉庆丁巳始发刊”。（李福祥：《序》，光绪谱卷首）

父英文公谱牒开端数行，未记年月，大抵在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岁以前，亲承曾大父元卿公所讲授者也，后亦随事续记，故墨迹浓淡不一。元衡公为忠武公第七子，江西观察公十一世孙，自宋室南渡避地居万载高村，至明初房祖绍铨公已历十二世，中间七世名阙，谱牒惟举名存者，故数房祖为五世孙云。荣陞识）^①

李荣陞将李英文所推论的始迁祖迁万时间，从唐改正为宋；又将李英文对于子孙后代拓基辟土的期待，从原来比较偏重于风水的“地理”，改正为更为文雅的“仁里”。

英文公谱牒的其他内容，也存在不少错漏之处。如在记载冷水坑古路凹祖坟山的谱图中，误将祖婆的姓氏搞混等等。如果从考证的角度来看，英文公谱牒对祖先世系的建构与记录确实有疏漏乃至错误之处，这与谱稿散佚，契约文据又被人隐匿不宣等原因有关。但换个角度来思考，谱牒的纂辑，至少表明高村李氏在清朝康熙后期已经开始整理本族的历史。为何英文公会在此时编辑谱牒？当时的高村以及聚居于此的李氏宗族的发展又是怎样的情形呢？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追溯到高村李氏宗族的开基。

1. 明代的高村李氏

无论是谱牒所推断的唐代，还是李荣陞考证的宋朝，以及其他族人所说的元末明初，^②最初来到高村的李氏宗族到底是怎样的情形，已经没有直接的文字资料。李荣陞也只是在考证始迁祖事迹的最后，简单而笼统地追溯了李氏入籍高村的历史：“高村在先无居人，（元衡）府君来自坪埠，舍蜀源，穷幽讨羈，栖龙埠之山湾，稍治庐舍田园，招佃聚邻，丛莽间渐成区宇，其后子孙遂以二十四都民户着籍焉。”^③

最早有文字记载的高村李氏族人，是天顺八年（1464）买下上高村冷水坑古路凹坟山的李万春。“据称万春公生于天顺，考天顺八年公买古路凹山契载堂弟五人之多者，可为中证，知其时年已四五十，其生在永乐宣德间矣。”^④李荣陞此处的考证，极有可能是为了印证明初李氏即已经立籍高村。李万春的父亲李绍铨一共有五兄弟，但只有李绍铨和李绍镰两人在高村立足繁衍，发展成后来的东房和西房，也就是图甲册中的六甲李细牙和八甲李法孙。如果按照族谱另一处地方的记载，“前明天顺时，同祖兄弟仅春、兴两人，同居同业”，^⑤那么李万春的生年就不会那么早，相应地，东、西两房房祖立籍高村的时间也就不会是在洪武朝，而是要晚一些。^⑥

隆庆万历年间，在宁州、万载、新昌交界地带发生了李大盞之乱，政府为了平定这场动乱，发动地方乡勇、义总参与围剿。高村李氏的李果蕃（字凤州，行

^①光绪谱，卷首《旧序》。

^②此说为李荣陞从兄李荣端所持，见《本支续撰谱稿书后》，光绪谱，高卷。

^③光绪谱，父卷《先世汇录》。

^④李荣陞：《本支续撰谱稿书后》。

^⑤光绪谱，子卷《坟山志·狮形》，第4页。

^⑥事实上，明代万载图甲体系中的甲户经常发生变更，如东都四图福寿坊八甲的甲户本为“易政”，正德元年改为“龙政”。二都四图九甲的甲户本为“何文政”，正德元年改“刘发”。同图二甲的“丁秀显”，嘉靖元年改为“张秀显”。类似的变更，大多发生在明中期以后，天顺朝的甲户变更，比较典型的如沙桥丁氏，“明例以族大粮多者充粮长，时列祖欲免粮里累，天顺间爰分籍四递，于十都二图中，泰辉公为一甲衍庆祖，光辉公为十甲衍庆祖，和辉季辉二公则为五甲、四甲衍庆祖。”参见丁时可：《万载沙桥派图说》，道光二十二年（1842）《万载沙桥丁氏族谱》。

文五)也参与了平乱,并受到政府旌奖:

明八世祖凤州府君讳果蕃,生值正德嘉靖间。万历初,巨盗李大銮阻守新昌之黄冈,披各州县深山为五峒以扰民。巡抚潘公季驯督五营兵遮贼,各募乡勇为之。先府君导入黎源峒支党所聚处,而守备邓君已袭破老营,贼溃而东,格于途,益败匿,遂进焚其巢。会诸峒亦次第破,盗悉平。知府郑公惇典上府君之劳,得给品服,以尚义良民旌其间。既而铜鼓设守备,黎源设队长,严田设汛,里中东北晏如。^①

藉用地方力量以平定叛乱,是江西巡抚潘季驯的一项重要举措。地方力量参与的方式有多种,那些地方上的豪族巨姓,“每族查访平素尚义及家势才力足以压服人心者一名或二三名,有司以礼召至,立为义总”。导官兵入黎源峒支党所聚处的李果蕃,之所以会受到官府的征召,凭藉的更多是个人的出众技勇:“府君智优而多力,琢二石鼓各数百斤,乡里元宵以当纸鼓之戏,常侵夜过绿林徒手毙数贼,贼党畏之故易有功。”^②就当时的高村李氏宗族而言,至少在李果蕃这一房,还远远称不上是地方的豪族巨户。根据嘉庆谱所追溯的谱系,东房从绍铨开始,一直到果蕃都是世代单传;另据万历十三年(1585)李果蕃与西房所立冷水坑古路凹狮形坟山约据,由其祖父李万春买下的坟山,当时只葬有李果蕃的曾祖妣及果蕃之父母之墓五冢,人丁并不兴旺。所以李果蕃参与此次平乱的身份应该是“乡勇”,其事迹也一直没有被县志所收录。^③

按照潘季驯的政策,那些平乱有功的“义总”,可以享受到“免伊本身差徭,令其管束一方”的优待与特权。李果蕃作为导兵入山的一般乡勇,除了给予品服之外,没有资料显示他是否也享受到类似的优待。但李果蕃此次义举对于高村李氏宗族来说,最大的意义就是藉此开拓了一块新的祖产:“府君更于西源浏阳界山邓君立功处,货其地招佃守之,表其名曰邓公岭,于是豺虎之区通人迹矣。”^④邓公岭的这处祖产,在清代乾隆年间李荣陞前往催督之时,已经是“棚棚连络百十里,侨民资竹纸以生,岁赋主息十之一”的繁荣景象。^⑤

除了开拓泰溪源头的邓公岭山场,高村李氏在万历三十一年(1603)时,又买下了祖居附近上高村冷水坑山场的一部分:

万历三十一年二月初十,东隅一图彭玖立契:今有父管蕃竹山壹帐并杂柴山壹帐相连,坐落地名冷水坑黄岗竹窝,并荒田租八石在内。因田墩荒芜,年久难以贖粮,托中召到二十四都二图李处承买,当议丝银五两正入手完粮云云。计开东水漕,南至茅栗岭脊,北至黄毛岭大路,西至九□尖观界。见卖叔秀才彭大管,中人卢唐五、厉十,辛明续,易四三,须凡生,徐廷奉,陈国六俱书押,印。加新印。^⑥

这则契约比较引人注意的有两点:其一,卖主的籍贯乃是县城东隅一图的彭玖,而高村远在僻壤;其二,彭玖卖山的原因,是田墩荒芜,年久难以贖粮。这也意味着,高村李氏宗族所居之地,其周边很多田产山场,其所有权都曾是县城

^①光绪谱,父卷《凤州府君述》。

^②《凤州府君述》。

^③直到道光十二年的《万载县志》才有收录李凤州(果蕃)以乡导给品服的内容。这应该与李荣陞的努力有关,此版县志早在嘉庆初就提议兴修,当时推举的主修是李荣陞,而且李荣陞也已经为此做了一些准备,如前引山川志部分。

^④《凤州府君述》。

^⑤李荣陞:《邓公岭经行记》。

^⑥光绪谱,元卷《公据》,页19。

或其他都图甲户所拥有。但是在万历年间，出于规避完粮风险等原因，开始出现转让田产山地的现象，并一直持续到崇祯年间。

2. 清初的高村李氏

明末清初时期的高村，印象深刻的是不时的天灾人祸。据载：“丁明之季多怪变，地震水患，河垵数易”；“崇祯九年、十年五月，并大水冲坑，田地土压为山，低洼者水划为河，民房荡洗甚众。十五年五月复大水，麻栅邱仰寰聚众结寨天井塌，行劫破城一十三次，至甲申四月方受抚。”^①待到清初，“顺治三年丙戌夏秋大旱百有余日，赤地千里。四年丁亥春大水奇荒凡六阅月，百姓饿死枕籍，白骨如山，谷每石八九两，米每斗一两八九钱，民多阖户死者。”^②康熙十三年，棚民朱益吾聚众倡乱，对万载乃至袁州府都带来了巨大的震荡与破坏。在这种动乱与天灾频仍的境况下，幸免于难的地方居民，或“间起为盗”，或“挈家辗转”。高村李氏东房一支则在此逆境之下，反而获得了发展的契机。

契机之一在于李天晓（1663-1684，字元卿，行金二）将本保豪家废弃的神灵请回了家中供奉。据族谱中所载：

处士年四十未举子，念无可致力者。保社为康公庙龟石湾，冀以御厉。豪家集众毁之，弃神于水，处士戒勿与校，迎像祀家中。本朝初定鼎，县犹属偏隅，处士营小庵宅右凉坑口，塑金仙像，招僧化人于善。顺治三年、丁亥大荒，里族多死，而灭神之众斩焉。处士以重价售枞阳米负归，延活仅数口，所娶黄孺人逝，弟天枢亦逝，孑然顾影，将遂为僧。亲友交劝，谓后嗣事重，羸侄不可恃，亦梦大翁戒之，处士乃洁斋集道流为醮章，追荐诸酷死者，因以卜可否于天。计日化楮财，值阴雨，处士匍匐仰天自讼，风忽转霁日晒场以卒事，溪雨如故也。年四十五乃娶辛孺人，又二年举一子，处士喜曰：吾家待之重生也。故以为小字，即英文公也。复举一女，适杨，亦为烟竹一族祖。^③

透过这段文字，我们可以深刻体会到“迎像祀家中”这一举动对于高村李氏东房的意义。正是因为有此举动，年过四十的元卿公不仅安然度过了丁亥奇荒的天灾，还老来得子，延续了香火。后来能够发展到分衍为六房，此次迎神之举而得到的神灵庇佑，可谓至为关键。但是这段材料除了讲述了一个“神佑信众”的故事，也反映了地方权势格局的递转。

据李氏宗族的后人援引当地道士的说法，在明末清初的动荡时期，李元卿迎回家中祀奉的神灵，是原来供奉在保社康王庙中的“大保英烈康王”神。康王庙是江西境内比较常见的神庙之一，关于其祀奉的主神康王，宋代以来众说纷纭，有周康王、楚康王、康保裔等诸多说法。^④高村李氏宗族认为他们所祀奉的康王是宋代名将康保裔。抛开康王神的身份不予讨论，对于地方社会而言，康王庙的一个主要作用是保障一地之平安。何安娜(Anne Gerritsen)在吉安田野考察中，得到的一个印象就是“在多个村庄，他们把康王看作该地域的保护神（本方里主或本方福主）”。^⑤这种信仰的源头，应该是宋元时期在基层社会曾经实施过的

^①光绪谱，父卷《元卿初十述》。

^②雍正《万载县志》，卷12《灾祥》。

^③光绪谱，父卷《元卿处士述》。

^④杨品优对江西境内康王信仰的“原型故事”有过专门考证，参见：杨品优《宋代以来江西康王考论》，《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⑤何安娜著，陈宗文译《十三世纪江西吉安乡村的神祇崇拜——历史学家的田野调查》，《南方文物》2005年第2期，第132页。

某种制度。^①在赣南信丰县的安西乡，“康王福主”也被乡民称作“三堡老爷”，分别与安西的行政区划上堡、中堡、下堡对应。^②高村的康王庙最初是建在龟石湾的龙陂，所以又称龙陂祠。“道流疏本家籍贯仍云龙陂祠保山湾居住，沿宋元旧祇也。”^③因此，“大保”除了表示康王的神号之外，还意味着地理空间与信仰空间的划分。康王庙的修建，其经费也主要来自保内民众的捐资，通常地方上的豪族巨户会在其中发挥主要的作用。

但就是这么一位与地域社会有着密切联系的神祇，却在明末动荡时期，被当时的“豪家”“以不利己宅，乘盗四起辄毁庙投像”。待到清初李氏宗族因为将神迎祀家中而备受庇佑，而那些曾经抛弃过本保神祇的“豪家”则已经是“灭无遗口”。有此效果显著的因果，自然引得“本保人愈争事神”，但此时对于本保神祇崇拜的主导权，已经从往日的“豪家”转移到了高村李氏的手中。

刚刚将康王庙被废弃的神祇迎回来的时候，李元卿还是在家中祀奉。到了清初，经历了丁亥奇荒，同保之人又争相事神，于是李元卿在祖居附近的凉坑建了一座建福庵，募僧住持。顺治十六年（1659），李元卿携其子李英文，并族弟李继武及男孟春，“一族两支仅得四人”，募化乡众五十人一起塑造了护法韦驮尊者像，希望可以藉诸佛力，普度因丁亥奇荒而去世的乡民。重新建立的这座建福庵，不仅成为本保民众的信仰中心，也成为当地漕运军户的崇祀对象。“康熙四年乙巳，袁州卫丁姚奉明、易魁明舟行大江，遭颶危甚，恍惚间一客来，为经理获济，问姓名惟言寓居万载高邨里。比二子来谢，遍问无其人，偶入凉坑庵，见尊者像与客肖，惊异，为制龕刻姓字而去。”^④

正是借着迎神、建庙的举动，高村李氏成功地掌握了地方信仰体系的主导权，从明末备受豪家曲侮，发展为清初的取而代之。

清初高村李氏宗族获得的另一个发展契机，就是兵燹过后的里甲重整。康熙十三年，宜春棚民朱益吾在三关九图一带起兵，响应吴三桂的叛乱，给地方社会留下“甲寅兵燹”的深刻记忆。此次动乱“起于宜，肆毒于万”，虽然战事主要集中于万载的三区、四区，实际上全县六区均遭到程度不一的破坏。大量田地荒芜，人口流失，甲寅之乱对地方原有秩序是一次全面冲击。因此，当动乱平息之后，地方官员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招揽流亡，以尽快恢复地方秩序。

在地方官员的大力招徕之下，一些逃离各地的万载百姓纷纷回到故里，也有一些异邑农佃闻风而来，结茅开垦。^⑤僻处偏隅的高村，也经历了因战乱带来的甲户逃绝，以及乱平之后的秩序重建。在这个过程中，高村李氏宗族又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族谱中的传记讲述了李元卿中年所得之子李重生，在动乱前后经历了逃亡、返乡的故事：

府君讳菁，字英文，小字重生，姓李氏，居万载之高村里，单传累世矣。生顺治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为儿童志趣不凡，弱冠已任事。康熙十三年耿藩倡逆，宜春棚民朱永胜因之蛊众，里中无赖竞起，府君随族人造其穴，谕以逆顺祸福之说，甚辨。既归，贼愧且忿，引兵躡其后，族人遇害，府君趋

^①或许与基层社会的里社制度有关，也有可能与保甲体系有关。在万载的田野调查中，我们在株潭的石塘村看到一座社庙，额名“大塘保”。其背后的制度背景，还有待进一步思考。

^②杨品优：《信丰安西三堡的康王信仰》，《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第43期，2006年4月，第30页。

^③《龙陂祠英烈考》，光绪谱，元卷《公据》，第38页。

^④《脏疏考》，光绪谱，元卷《公据》，第34页。

^⑤常维楨：《申详荒绝文》（康熙二十二年），雍正《万载县志》卷6，第89页。

间道得免，挈家辗转分宜、上高山谷间，自托于强宗。十七年贼平归里，时县境大半莽为墟，高村上下数十里惟李氏一户，合户之壮惟府君一人。知县事广宁常侯维楨，山东刘侯体元前后多其才，并旁里委之，府君为之悉心经理，招徕流氓，抚绥疲户，堵御余孽，劝化宿顽，季年乡户完复，无追呼之扰。^①

在这段故事中，比较有意思的细节是朱益吾倡乱之后，高村和李氏的反应。因为地处僻远，所以一直以来官府比较头痛的问题是，不能区分到底谁是贼寇？谁是窝户？谁是良民？万历李大盗之乱时的“义总”政策之所以会出台，就是官府要与贼寇争夺这批“山居之民”。但历次盗乱都无法避免山居之民加入盗贼现象的出现，前引《元卿处士述》时就已经讲到，明末清初天灾人祸频仍之际，“民贫病，间起为盗”。这次的康熙甲寅之乱也未能例外，“里中无赖竞起”，高村的一些居民也成为山贼。因此，传文中记载了英文公“随族人造其穴，谕以逆顺祸福之说，甚辨。既归，贼愧且忿，引兵蹶其后，族人遇害，府君趋间道得免，挈家辗转分宜、上高山谷间，自托于强宗”，强调了李氏宗族与贼寇之间的区别^②而这也为康熙十七年李英文重新回到高村，并以本图独存甲户的身份，完成承差其他甲户、招徕安置外来移民的一系列举措，提供了一种正当性与合法性。

康熙十七年以后李英文在高村的经历，反映的是当时万载县对图甲体系进行重新整理的历史场景。对地方图甲体系的整理，就官府而言是完成赋役任务的保障之一。对于身处图甲之中的民众而言，这样的整理工作，也可以成为其发展壮大的有利时机。李英文之所以能够在战乱之后受到多任知县的青睐，委以保正之职，一方面是固然是“高村上下数十里惟李氏一户，合户之壮惟府君一人”的客观事实，另一方面应该也李氏宗族在高村的居住历史不无关系。早在顺治年间，过往的那些豪家已经户无遗口。而李英文负责招徕的流氓、疲户、顽户等人群，大多应该都是万历以后，甚至是清初迁入的。在这种背景之下，虽然父亲元卿公双目失明，李英文“仅据醮簿及父老口传为手牴”，不仅是为子孙留下一份昭穆次序的依据，也是在强调高村李氏开基、入籍历史的久远，以及这种历史在重整的地方秩序格局中的重要性。

三、乾隆发凡与清前期高村李氏宗族的发展

嘉庆二年（1797）付梓的《高村李氏谱（东房）》，序言是李荣陞撰写的，其主体实际上是一篇写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的旧作。

荣陞自弱冠撰系略，不愜于怀，后渐窥寻名家谱意。乾隆二十九年偕兄弟就县祠发凡，未卒事。嘉庆改元，合族有提要之修，本支谓不可先疏后亲，遂集群秀缮系迹于庭山斋及厚冈之塾，今夏招梓福兴庵，念五十年来忝爱所存，闻其日增，爰区为九帙刻之，订甲申旧作以引其端云。谨按，李氏自虞夏皋陶官大理以来，商周之际始著姓于李，秦汉以下始别族为陇西赵郡。陇西之系详于唐书宗室宰相二表，冀雍兖豫乃其世居，大白所称“我李百万族，柯条被中州”者也。唐中世陇西郡公宪以西平名家，子观察江南西道，卒葬袁州，七子仕隐南土，布其裔于洪筠袁临吉，然后江西之李氏著闻，史所称西平父子善，宜有后者也。自宋室南迁，兵戎俶扰，人多择地而避，万载亦集有数支。我祖元衡府君由坪埠卜吉于本县之高村，万山深僻处，晦迹累代，

^①光绪谱，父卷《皇清赠文林郎英文府君家传》。

^②但是考虑到李英文顺治十一年出生，到康熙十三年时已经有十八岁，正是身强力壮的时期，所以也不能排除李氏宗族参与到盗乱中的可能性。依次推断，之所以贼人会前来追杀，导致李英文挈家远逃，也有可能是李英文与族人从贼巢逃走后引发的。

贫寡罕伦，以望他名宗几如毫末之植马体矣。陈定宇先世事略云：本房虽无显仕，然数世以来，寿皆八九十，无下七十者，父子皆亲传，无祝螟者，皆称善人，无一为人所指者。家虽空而行颇实，羹藜饭糗虽不给，而经炊史酌之味无穷，贫亦安足计哉。呜呼，所以表前世之德者，先哲之心同，词亦同也，小子何述焉。抑又闻近世施愚山先生之序水阳李氏云，世家易，大家难，此为好夸之子言也。谚则云：名家难，衰薄之家尤难。既衰矣，将何承之。必如愚山之训李氏者，户诗书而家礼让，崇本尚实，孝弟力田，族不必皆贤，而向善者众，有弗类者，耻之让之，其贤者慕效之，如此然后可起其衰薄。呜呼，岂易承耶。为吾之族者，处而农士，出而官，知其难而相与勉焉。立其身，尽其孝敬忠良，夙夜无怠，以保有令名，彰我祖考勤勤培养之遗，庶几无忝于本系哉。嘉庆二年岁次丁巳仲秋月具官陇西公下二十一世高村本系二十一世嗣孙荣陞顿首敬撰。^①

序文的主要篇幅，从李氏得姓之始，一直追溯到立籍高村的发展历史，并藉施闰章之文，表达了对于高村李氏成为地方名门望族的期许。在写下这段文字的前一年，李荣陞刚刚中了进士。这段文字又是李荣陞偕兄弟在“县祠”，而不是僻处深山的高村写下来的。从纂辑谱牒到在县祠发凡的这几十年间，李氏宗族的发展也从高村拓展到县城。

康熙谱牒开端数行的最后，对李氏族人有有一个期盼：只要有机会，尽可以迁居到高村以外的地方去。说这番话的人应该是李元卿，而他的儿子李英文也很快就为此进行了实践。康熙四十五年（1704），李英文在万载县城西面的锦衣坊，“买王嗣典天符庙侧锦衣坊屋基土，庙背书院土，正屋墙背基土，城墙下园土皆一连有契（并缴蓝文彬、周着四、李南生三旧契），及身构造前半三进”，^②从而置下了高村李氏在县城的一份产业。那么为何高村李氏会在这个时期会有在县城置产的举动呢？推原其故，既有生存环境的因素，也有宗族发展的考虑，同时也与当时整个社会的风气有关。

明末清初的社会动荡，令万载县各地都元气大伤。乱平之后官府的各种重建举措，主要的受益者是那些交通便利，人迹易至的地区。康熙年间，万载共有市镇 11 处，战乱兵燹过后，交通条件较好的几处也率先恢复了繁荣。“诸市上通湖湘，下达省会，商旅往来辏集。向因兵燹之后，居民鲜少，物力艰涩，故商旅亦非昔比。今升平日久，潭埠、株柱潭、大桥等处水陆交通，商贩贾客复为凑集矣。”^③但对于高村这样僻处偏隅，动须岭行的地方来说，整个生存环境还是非常艰苦的。李英文的母亲辛氏被称赞“仁心被於物”，因为“豹尝盗鸡戴笼走，大母持杖格出之。蛇蟠筐缕中，呼之以儿不忍捶”。^④即便是山湾这样人迹聚处之地，也仍然是豹、蛇时至，这足以说明当时环境之艰难。而在周边的山莽丛林之中，更是虎豹虫蛇之穴。族谱中记载的李英文二儿子李士琦（1680-1695，字琴若）传记，详述了当时条件之艰与开拓之苦：

二善士讳士琦，字琴若，本取瑟若为义，以音不便呼改焉。生当朱寇甫靖时，所居里僻远于县，山深通大围少人居，兽数百为群，侵害禾稼，田数啮于水，佃人毒之。善士既冠，偕其徒习为鸟枪师罟师，上下搜抉，若九顶

^①李荣陞：《高村李氏族谱序》（东房），载光绪谱卷首。另见《厚冈文集》卷 11，第 20~21 页。

^②光绪谱，元卷《公据》，第 11 页。

^③康熙《万载县志》卷 1，第 20 页。

^④《李母辛大孺人八十寿序》，光绪谱，父卷《先世汇录》。

熊岩枫城诸高险处，宵旦坐荡为常，以鲜食掇艰食，手戕鸷兽数十。狮墩及黄石下潭洞深数寻可藏怪，时没入探之，其魁勇如此。久而兽衰徙，即焚其具，更以平易道路济人。先施功于沿溪，小险皆应手。旧数万载之险首高村黎源，高村南出县阻茅源岭，东出上高阻环溪岭，并鸟道高悬。大父英文公始募人砌茅源路，为憩亭，而环溪之壁削成际天，善士投身水中往复图度，卒募健匠寸凿之，积数岁石屑满江，路平可通两轨，行人骇叹为序之碑，居旅以是众至，比之附郭焉。^①

李士琦决定在环溪岭修路，是在乾隆十四年（1749）他七十岁的时候，三年后路修成，于是出现行旅众至、比之附郭的情形。^②但即便是在这个时期，也还是出现“虎暴伤人，诸子募弩师，机毒矢，射杀数虎”的场面。^③

李英文在康熙十七年回到高村之后，除了负责招徕催征，同时也充任了本图的保正一职。该职本来是“里递轮充保固地方之人”，既然二十四都二图只有李氏两户，合户之壮又只有李英文一人，李英文又人丁兴旺，育有六子，所以长期以来，保正之职都是由其充任。在年老体衰之后，长子李焕若又代为执役多年。保正之职，主要的工作就是负责保固地方，同时积极配合官府的各项工 作，出谋画策。“县侯若许（名盘），若何（名锡命），若孙（名国柱），若郑（名国栋）咸宾礼之，谘访阙疑，多所裨补”。^④雍正元年发生温上贵动乱之时，即便年届七十，身为保正的李英文也还要“导府兵入清余孽，务脱人于疑似不惮烦”。曾经代父执役的李士璠（1676-1736，字焕若），其传记内容在描述保正之职与官府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揭示了住在县城给此职役带来的便利：

处士讳士璠，字焕若，大父英文府君冢嫡也。才器肖之。府君职里老于乡，构别业于西城，令处士偕弟子习学亲师。处士既入武庠，三弟隶弟子员有声，乃兼赞家务。乡民抱穷弊称是非来者，经处士指画不终讼而去，前后县侯若庞、若施、若许延之宾坐，有所访必竭其诚。侯或下东乡，将抵高村，处士执弟子礼迎劳于途。既就馆，府君以部民礼见，必握手咨询。移时处士掖以退，然后就坐。比回县，辄施行。大抵府君晚岁之勤劳，处士致力为多。所纳交率知名士。上高徐孝廉徽官普安，致于幕，归不携一物。新昌熊文学德，以豪富为盗所引，谋之府君父子，为徒手出之。父子屡为人排解，未尝责报也。府君不问田业，处士偕诸弟劝谓：食口日繁，然终忧粮为累，惟念九顶山阳先莹所在，不得已买族人山置庄卫之，其余终府君之身，营田金不满百。处士代巢谷于省垣，售书以归，府君喜曰：吾志也。留之县以便观考。乾隆元年年六十一，先府君一岁卒。孺人邓氏，亦有治内才，诸奴畏之如姑。处士坐客尝满，或有招致陈筵数十，孺人隔帘筹论即摒挡仆妇治具卒事，宾客不闻其声，先处士歿，殓城外，其后长孙如梅挈归葬之掌形坪。处士先葬城西荷花塘，后改葬燕子坞，皆在上村。^⑤

知县下乡，保正是其主要的咨询对象。所以保正实际上是官府与地方里民之间联系的重要环节。因为与官府之间联系的密切，再加上居住于县城，所以可以比较便利地达致“所纳交皆知名士”的结果。康熙四十八年为李英文母亲辛氏庆寿时，由万载县儒学训导以及袁临协标防万总司和万载典史领衔的祝寿名单，囊

^① 《琴若二善士家传》，光绪谱，父卷《先世汇录》。

^② 李荣陟：《环溪岭改路记》，光绪谱，父卷《先世汇录·琴若二善士家传》。

^③ 《运之四善士家传》，光绪谱，父卷《先世汇录》。此事发生在乾隆十四年。

^④ 《李翁七秩荣寿序》，光绪谱，父卷《先世汇录》。

^⑤ 《焕若处士家传》，光绪谱，父卷《先世汇录》。

括了地方文武官员，以及辛、郭、彭、巢、胥等诸多古户大姓，而“李君职公家之事久住西城”正是一个重要的契机。

这份寿文中还有一处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万载儒学训导李锡之所以会接受邀请，另一个因素是李英文的两个儿子“器识皆不群，士珍文名尤籍”。士珍（1683-1714）是李英文的三子，字席上，是高村李氏第一个以时文获得功名者。据其传记所载，“处士不乐弓马，就师学时文如律，得隶弟子员。益攻苦，遍交东乡暨城居士友，从所请转为塾师，如县西净土庵、虎符迴澜书屋，皆主之，弟子多知名，文誉日起。四十八年县侯郑国栋以腾芳菽苑为额，大期之。”^①之所以传文中会专门提到说士珍“不乐弓马”，是因为他的大哥李士璠所入者即是武庠。但无论如何，李士璠、李士珍两人前后获得文武功名，打破了高村李氏“有明二百七十年率隐德弗仕”的格局，这都得益于李英文“构别业于西城，令处士偕弟子习学亲师”的举措。此后李英文的五子李士琦（1692-1767，字定策）“壮岁从焕若大处士习弓马，得录武学弟子”。^②六子李士琏（1695-1768，字嘉玉）“髫年从其三兄席上处士授经书业举子，弱冠游学西城。处士早谢世，益攻苦著文誉，补县学弟子员。未几进增生。”^③先后四子名列宫墙，都是借助于县城的这座房产作为读书求学之所。最后，李英文得以能免去被人视作贱役的保正之职，一个原因是年逾八旬，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他已经有了四个获得功名的儿子。因此，城居成为高村李氏从乡村贱役发展为名叨宫墙的重要转折点。

高村李氏向县城的发展，其背后的时代背景，是清初的城居化风潮。作为政治和文化中心，省府州县城在明末清初的历次战乱中都是最主要的军事目标之一。

“十家九家声暗吞，城中人少荆棘存”的诗句，形象地揭示出战争给城市造成的破化程度之深。所以清初的各级官员，纷纷以招徕民户回城作为地方秩序重整的重要措施之一。顺治十一年，江西巡抚蔡士英专门多次发布告示，要求自省城直至各县城，都招集士民入城居住。为了鼓励民人入城，给出了诸多惠政。例如给与房屋所有者以产权：以三月为限，“凡有主基屋谕令速归，无主基屋听人承造。如过限不至，即有主基屋亦作官地召赁，不论土著士民工贾，但愿承住者许其造建开张贸易，官给印照，着为永业。”另外还严谕有司不得增加入城居住者的负担：“凡入城之家不得擅派排门夫役及一切差使，致令居民烦苦难安。”^④康熙甲寅之乱时，因为风闻叛军将要攻城，一夜之间万载县城顿成空城。待到复城之后，万载知县吴自肃一方面积极组织乡勇亲兵，另一方面招集百姓，仅康熙十四年一年，“该令前后招抚过难民辛敬和等男妇共四百余名口”。随着城居化风潮一同出现的，是各大族纷纷建祠于县城的现象。^⑤

李英文康熙四十八年买下县西锦衣坊的住宅之后，最初打算一直作为书馆供子孙读书问学。乾隆二年英文公去世后，“子孙将两旁房间分闾居住，其前后正厅门楼四围巷路依前不分，约据甚明，孙枝同念大父基创之勤，议置为英文公享堂。”“自此城居之众腊祀有凭，生童应试之聚此者，咸得致敬香仪具文而已。”^⑥高村李氏将其在县城之居，改为了一座享堂，只是从规模来看，这座享堂是无法

^①《席上三处士家传》，光绪谱，父卷《先世汇录》。

^②《定策五处士家传》，光绪谱，父卷《先世汇录》。

^③李荣陞：《皇清敕赠文林郎庭山先生家传》，光绪谱，父卷《先世汇录》。

^④蔡士英：《巡临饶抚建广诸属招徕士民入城居住示》（顺治十一年六月初五），《抚江集》卷12。另外，在同年四月初四，蔡士英还发布《招集士民入城示》，鼓励士民入省城居住。

^⑤参见拙文：《祠堂、宗族与地域社会》第2，南开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

^⑥《西门锦衣坊祖居约据》，光绪谱，元卷《公据》。

和城内其他各大族所建的宗祠相提并论的。乾隆二十三年，万载全县十七支李氏联合兴建了一座李氏大祠，高村李氏同时以高村以及县西锦衣坊的里递，参与了这次宗族的联合与祠堂的修建，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①李氏联合建祠之举，完全是应对当时竞相建祠于县城的风潮所致。只有在县城建有祠堂，才是风气近古的表现，也才能体现出地方世家大族的地位。高村李氏也因为县城建有享堂的缘故，不仅比较便利地参与到此此次联宗的倡议，而且也在祠堂建成以后，得以在其中起着主导的作用。城居之于高村李氏的意义，由此进一步凸显出来。

乾隆二十九年李荣陞在县祠写作族谱发凡时，正是高中进士之后的意气风发之时。尽管在此前高村李氏先后卷入多场纠纷，诉讼多年，但都取得了胜诉。^②而他本人在科举功名上的成功，也是其祖父李英文构宅城西之后，多人先后名叨宫墙的延续。多年之后回顾这段历史，他更加确定这是高村李氏宗族的一段黄金岁月：

方乾隆二三十年间，二伯父兄弟四人同怀同地，并称寿考。四孺人席于内寝，男妇迭起为寿，必请所规。其时兄弟翁和，子孙眈慕，期功之戚罕闻，可谓户户重庆，井闾传夸者矣。^③

四 嘉庆房谱与清中期的地域社会

万载县内诸支李氏在乾隆二十三年联宗建祠，直到嘉庆元年，“十七房既分编支谱之前，系以为殊派当思同源，拟为提要若干卷”，于是公请由云南告病归里的李荣陞出面主笔。^④这一年的五月末，谱局设于兴江口明觉院，“两旬中编次三之一”，因为时值大暑，谱局中多人生病，李荣陞于是先期返回，其余人员也在中元节散去。到了八月再次开局于皂山庵时，李荣陞没有参与赴局与修。次年四月末，万载李谱提要谱局移至高村福兴庵，匝月乃成。^⑤从嘉庆元年暑期到次年四月移局高村期间，李荣陞没有参与合族提要的纂修，而是有感于“不可先疏后亲”，“遂集群秀缮系迹于庭山斋及厚冈之塾”，并于次年夏天于福兴庵招梓匠，刻印了由他主纂的《高村李氏谱（东房）》。无论对于合族的提要，还是高村的东房谱，李荣陞都在编修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1. 李荣陞其人其事

顺治初年高村的李元卿，在丁亥奇荒的天灾之下，百般努力也未能阻止妻子黄氏和弟弟天枢的相继去世，孑然顾影，一度萌生了出世的念头。后来年过四十五娶妻，二年后又生了一个儿子，李元卿甚感欣喜，为儿子取字“重生”，即李英文。此后的高村李氏逐渐人丁兴旺，李英文先后生了六个儿子，六子李士璠（字嘉玉）又生了八个儿子，其中第五子即是清代万载县第一个进士李荣陞。

李荣陞（1727-1800）出生于高村，直到乾隆六年（1741）才第一次来到万载县城，但随着科举的成功，其足迹也跨出了万载，涉足到更为广阔的空间。光绪二十九年（1903），地方士绅联名具禀，李荣陞因此得以被奉入万载县乡贤祠崇祀，充分反映出其在万载社会历史上的影响与地位。此次具禀所附“履历事实清

^①李荣陞：《安仁坊李大祠述》，载民国《安仁坊李大祠章程》

^②这一期间高村李氏卷入的纠纷诉讼，分别有乾隆元年的顶带案（《附录举报顶带断案》，光绪谱，父卷《先世汇录》），乾隆八年的如玉争坟山案（光绪谱，元卷《公据·狮形冒认祖冢案略》），乾隆二十年的冷水坑祀产案（《冷水坑盗谋祀产案略》，光绪谱，元卷《公据》）。

^③李荣陞：《琴若二善士家传·按语》。

^④《族众公请纂修启》，嘉庆二年《万载李谱提要》。

^⑤李成菊：《后序》，嘉庆二年《万载李谱提要》。

册”，^①先后列举了十七项李荣陞的事迹，包括他的基本履历、在湖南及云南时期的宦绩，以及他本人的一些特长与成就，较为全面公允地总结了李荣陞的个人情况。例如事实清册列举的第一条，非常详尽地罗列了李荣陞的科举与仕宦履历：

一 故绅姓李讳荣陞，字奠基，号厚冈。世居江西袁州府万载县，由优廪生中式乾隆二十四年己卯正科本省乡试第六名举人，二十八年癸未会试中式第二十九名贡士，殿试第三甲四十名引见，以知县归部铨选。三十八年六月初二日热河陪班引见，掣签得陕西徽县知县，例以就近改授湖南永兴县知县，八月初九日引见给假便道省墓。三十九年二月初十日到任，本年甲午正科奉调湖南乡试同考官。四十年六月丁内艰回籍服阙。四十四年赴补，二月十一日引见，奉旨：以知县发往云南差遣委用。钦此。九月二十二日抵滇省，十一月委署云州知州，十二月二十四日到任。四十五年五月奉委盘查普洱及大理府属。九月兼署緬宁通判。四十六年正月以署州衔奉委督运庚子、辛丑二运京铜。四十七年三月抵天津，五月运交户、工二部讫。十月引见，著以原职回任，给假省墓。除夕抵家。四十八年六月到滇销差，补授呈贡县知县。七月初六日到任。是岁癸卯正科，聘充云南乡试同考官。九月回署。五十年奉旨：送部引见。三月初三日卸事。五十二年三月到京，四月初九日引见，奉旨：仍发往云南以知县补用。钦此。十一月到滇，题补嶧峨，委署恩乐县知县。五十三年二月十二日到任，五十四年己酉万寿恩科聘充云南乡试同考官。十月初八日接嶧峨篆。五十七年四月告病请准开缺。五十八年应聘大理书院山长，五十九年六月到籍，居家七载。生于雍正五年丁未闰三月初八日，殁于嘉庆五年庚申十一月初一日，享年七十有四。

而以下几条，则是关于李荣陞在学术以及乡里实践方面的内容：

一 故绅幼时受句读，以神童称。读诗“无将大车以尘垢”韵乖，疑疵为□之误，信古笃学出于天性。自幼及老，孜孜不倦，博稽独断，一以义理为宗。故虚公无滞见，推求至理多心得。尝测五星某日当聚奎，至期果验。于圣贤心迹剖析深微，实有先儒所未发者。学行为一时最，士林称为厚冈先生，至今不衰。生平著作甚富，江西通志採入周易篇第三卷，易考二卷，易续考二卷，尚书篇第一本，尚书考六卷，四书解细论一本。又厚冈文集二十卷，诗集四卷已经板行。尚有禹贡山川考五卷，年历考三卷，国风解二卷，礼经考五卷，庸考四卷，论孟类四卷，孔圣考二卷，孟子游历考二卷，三皇通考略一卷，三皇汇典七卷，黑水考证三卷，地脉三卷，运铜记四卷，游历稿八卷待梓……其古文选入国朝文录，自成一家，学者奉为圭臬。

一 故绅足迹所到无不考求精确，于南干之龙曾躐其首，于大江之水又沿其流，故所作云緬山川志皆古书之所未闻，而所撰九江彭蠡考亦昔贤之所未道。陟苍山，泛洱海，游大别，登白帝城，上黄鹤楼，访六诏遗迹，榻蒙氏钟文，谒少陵遗像，凡所以明古迹之湮沉，辨旧说之讹误，皆原原本本，非同臆揣之谈。

一 故绅崛起草茅，以甲第开一邑之先，于邑中英俊多所成就。如进士辛炳晟、孝廉辛文彬皆体用具备，政绩标炳。诸生中胥桐林、郭登南、郭如藩、辛炳云均推老宿，传胪辛从益亦常就正。而于乡愚深恐惑于他歧，敬刊圣谕广训十六条与王士晋宗规、颜侍郎家训、陆梭山正本制用各篇千余部，俾有宗祠者得循先儒会族之意，朔望宣讲，迎机导化，务期比户可封。又念家世寒微，敦根本，厚栽培，建宗祠，辑谱牒，遵家礼，定祭仪，条家规，训子

^①载光绪谱，曾卷《家集》，《奠基公乡贤录》，页28~34。

孙，修先茔，立家塾，靡不竭力焉。

根据清册中的这几方面事实，从学术方面讲，李荣陞无疑是一个著述宏富，长于考据的学者，体现出比较明显的乾嘉时代特色。嘉庆元年，万载李氏合族公请李荣陞出任李谱提要的主修，提出的一个其不能推脱的理由，正是只有李荣陞才能考证出始祖陇西公的事实。

此外，就地域社会而言，李荣陞也积极地发挥着一个地方士绅的影响力，不仅在文风士习方面作出表率，而且积极参与对地方风气的改良与陶铸，尤其是比较重视对地方宗族与祠堂活动等的改良与规范化。

李荣陞的《厚冈文集》中收录了一些族谱的序跋，大体而言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他在乾隆中期，当时他先后受邀为万载观上卢氏，云南呈贡的沐氏、缪氏、晋氏，临安茭湖傅氏的族谱撰写序跋。这一时期李荣陞对于宗族和族谱的理念，主要的兴趣是参考诸种史料，包括考察碑刻遗迹等等，对于各个姓氏历代名列仕版的祖先进行细致考证，在云南呈贡所作的几篇谱跋尤其明显。另一个集中的时期是在嘉庆初年，也正是他先后主笔纂辑《万载李谱提要》和《高村李氏谱（东房）》的时候。这一时期他的兴趣不再局限于考证索隐，而是更为重视族谱应该如何编修的问题。此时所撰写的谱序，反映了李荣陞对于宗族与族谱比较成型的理念。如嘉庆二年孟冬，李荣陞受邀为竹头卢氏族谱写序。和他乾隆三十八年（1773）为另一支观上卢氏所写的谱序相比，这篇序言中考证先祖事迹的内容已经大为减少，而主要的篇幅是在回答竹头卢氏族人提出的一个疑惑：“旧尝延里中士友受教令，今力薄勿能延，而众疑于自撰之鄙也，且若何？”族谱到底是请有文名的外人来主笔，还是由本族人自己来纂辑，孰优孰劣？对此，李荣陞的回答是，只须秉持一个原则即“实之而已”便可。类似的观点，也同样体现在他为胥氏所写的谱序中。^①为了阐明族谱贵实的理念，李荣陞还专门写了一篇《作伪辑戒》的文章。^②

为族谱写序，影响只及于少数的几个宗族。李荣陞另有一项举措，对万载各宗族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就是“履历事实清册”里面提到的“敬刊圣谕广训十六条与王士晋宗规、颜侍郎家训、陆梭山正本制用各篇千余部，俾有宗祠者得循先儒会族之意，朔望宣讲，迎机导化，务期比户可封。”高村李氏东房谱的祖卷内容为《规训》，其中就保留了一份完整的由李荣陞辑录的宗规族约。

李荣陞制定的宗规，对于万载各宗族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嘉庆以后所修万载族谱，很多都直接将这些宗规全文抄入谱中。随同一起抄进谱中的，还有李荣陞辑录的地方志和先儒谱序中所谈到的族谱相关论述。另外还有就是李荣陞所整理出来的祭祀仪节和陈设图等内容，其整理的根据是朱子家礼和朱文端公（朱轼）祭仪。

2. 乾嘉时期的高村李氏

如前引所述，乾隆二三十年代是高村李氏最为鼎盛的时期，县城和高村周围置有大量田产，人丁兴旺，科举辈出，与乡里、房支以及佃耕客民之间的纠纷都取得了胜利。在乾隆中后期，情况发生了变化：“自戊子岁六府君见背，五伯父已病足软，迁西郊天陂墩，二伯父亦随子住金盆架，远界浏阳。四伯父长斋不主祭，已而皆物故，惟五伯父卧榻十一年，届今三十年。荣陞辈行亦落落，六弟聋，七弟别住。徬徨顾影，望壮岁事邈若山河。”^③这种变化，既是高村李氏东房世

^①李荣陞：《胥氏族谱序》，《厚冈文集》卷11，第25页。

^②嘉庆《万载李谱提要》及光绪《万载高村李氏谱（东房）》均收录有此文。

^③李荣陞：《琴若二善士家传·按语》。

代更迭的结果，也是地域社会以及整个历史时代发展的反映。

康熙四十四年李英文在县城锦衣坊置买房产，是高村李氏东房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转折点。他的六个儿子，有四个都在这座县城的房子中居住读书，分别考取了文武的生员。由于没有获得更高一级的功名，李士珍（席上）失意而归，康熙五十三年（1714）去世，年仅三十二岁。原本随其一起读书学习的六弟李士琏（嘉玉），也在康熙末年生下第三个儿子后回到了高村。乾隆初年开始居住于县城的李士琦（字定策）“善心计”，一方面继续经营县城之宅，“取旧材为小轩于后，购书数千卷以娱文士”，另一方面先后经理西郊天陂堰之庄，构别业于西乡之白石里、归远之严田。但是这些产业，因为李士琦“晚年病良已，足又废，家政总于长子，未几次第弃之”。^①李荣陞耳闻目睹了高村李氏产业的日渐散失，对于创业不易、守业尤难的状况颇为感慨：

荣陞曰：人家自立难，永守尤难。虽有材，父不能必子之惟肖，所恃葛藟根多相持以不敝耳。先大父英文府君遗言，高村土薄，无以滋丁殖财，嘱子孙勿惮外徙，故及其身营西城锦衣坊住址，诸父亦多于郊里置庄有成效矣。身歿未几而他售，或不逮歿身，岂言固无验哉。忆自乾隆辛酉荣陞始出县访世父所购旧书，片帙无存，而五伯父方事续购，装潢弥月，未二十载尽为他家分取。推类言之，安有长物。姊夫王封翁语予云，吾家累世为内姻，置宅甚勤。今后裔□然舍之，他日何以见吾先人于地下哉。^②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乾隆三十三年（1768）高村李氏东房嘉玉公一支在高村附近的凤凰洲置买了一处新的山场，就显得弥足珍贵与难得。卖主是居于烟竹的杨氏，其契约如下：

乾隆三十三年二月十二日，杨日章等族叔公孙商议立契。有祖父遗下合管地名凤凰洲连河两岸等处山场杉杂竹木荒山空土棚屋地基菜园等项，原系八十分同管，今将己下应管七十五分托中送到李嘉玉，向前承买为业，得受时值价银贰百壹拾壹两正，其凤凰洲坐山北边，上至观音山大岭脊接狗熊岩，分水直下蜈蚣漕，到大江为界，下至俱至大江，右至随观音山大岭脊倒水直下龙形下手小塌第一层护砂分水至大江为界，右至漕背檀木坑，随岭脊分水至大江为界。又凤凰洲南岸上至尹家岭周王二姓田山为界，下至俱至大江，左至包人山，自岭顶直下分水，至大江为界，右至黄饶二姓山，至练坑口蝦蟆石小江直下为界，所卖至内不留寸土，永无增赎，任从买人发佃开垦成田，栽插架造立穴无阻云云。杨日章笔，代完笔仲淳，同卖缙绅御选、远侯、传宗、帝选、秀川、陞选俱押，见中杨永忠、廷升、惠川、溥章、胥明中、辛从龙，李唐贵俱押。印。

同年月二十日，杨司值同侄文方立契，将承管凤凰洲八十分内之五分一并扫卖与李嘉玉为业，得受时值价银拾六两正，见中人杨廷升、本忠、恭臣、风鸣，胥明中，张文在，辛从龙俱押。印。^③

这块山场的购置，对于高村李氏东房而言，也是一件非常值得庆贺的事情。在光绪谱中所附的“高村地形总图”，其中标注为“庄棚用”即从事造纸生产的山场，凤凰洲和邓公岭、冷水坑是其中最主要的几处。在买下这块凤凰洲的山场后，已经出继三房的李荣陞为此专门写了一首诗以示庆贺：“人人如翔凤，复得凤凰洲。凤从巢中出，凰从竹底游。溪光澄羽翮，山翠透喧啾。蔼蔼他年盛，九

^①《定策五处士家传》，光绪谱，父卷《先世汇录》。

^②李荣陞：《定策五处士家传·按语》。

^③光绪谱，元卷《公据·祀产》，第23页。

雛互命俦。”^①之所以这次购买山场，会让族人倍感珍贵，主要的历史背景是来自于客籍置产带来的压力。

乾隆戊子二月初，先府君卧病已半岁。一夕七弟维翰自下邳店来谒，闲叙凤凰洲山欲出售，因买户惜费未合。府君云，高邨尺土归客籍，子孙樵采无地，此山距上游近，可经营也。众踌躇公费，大兄凤高曰，我辈速凑成之。明晨饬维翰往，示意李杨世姻，又交重府君之契，中人廷升、卖主仲淳等无不忻然，顷而成交。踰月府君谢世，九月阖分，二兄君简感哭伏地不能已，约首云，弥留之际，为子孙计，谓此也。当即拟为祀产，以报先德。

李氏这次交易能够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李、杨之间的姻亲关系。如果不是“子孙两代五门互姻”的关系，就当时“尺土归客籍”的趋势而言，这块山场也极有可能被客籍买下。即便如此，客籍的势力也还是拓展到凤凰洲。同年，下高村的客籍饶氏也在凤凰洲置立产业。乾隆五十四年（1789），饶氏还在凤凰洲“砌石筑土，中嵌碑记，造文笔于其巅”。^②从乾隆四十四年（1779）起，李氏又因为冷水坑山场而卷入到一场诉讼中，“经三十余载”，“以致山败息薄”。^③在这场李氏未能再次取得胜诉的纠纷中，与李氏对峙的另一方主要是从事表芯纸贸易的客籍商人等。这场诉讼在嘉庆二年李荣陞纂修高村东房谱时，因“此案未结，故不录”，但案件所折射出来的李氏宗族的困境，颇能反映出正在变迁过程中的清中叶社会景象。

五 简短的结论

本文的论述，主要依据的是刻印于光绪三十二年《万载高村李氏谱（东房）》。这部文献的产生，实际上是一个历经了康熙、乾隆、嘉庆、同治和光绪等诸多时代的层累叠加。根据本文的讨论，嘉庆二年的初修房谱是在这些层累的叠加中最为核心的一次建构。这次族谱的纂修过程，也体现出清中叶嘉道时期的社会特性和时代特点：

1. 宗族的发展与分化。清中叶的嘉道时期，是中国宗族史上需要特别关注的一个时期。尽管明中叶的礼仪改革促进了宗族与祠堂的普及，但祠堂林立现象的最终形成则是在清中叶。此一时期不仅有合宗而建的宗祠，也大量出现了各房支分建的房祠。^④本文表二的数据统计表明，宗族发展的这一时代特性，同样也反映在族谱的编修上。嘉道修谱次数的增多，固然是宗族发展的体现，也与这时的宗族分化有关。高村李氏东房谱正是在修联宗的《万载李谱提要》的同时进行的，李荣陞为其作序的高城王氏也是决定独修房谱（支谱）。道光十六年（1836），有着“辛半县”之称的万载辛氏宗族也正式分为长、幼房各修房谱，则是嘉道时期宗族分化现象的最典型事例。^⑤

2. 士绅在地域社会的影响。李荣陞作为清代万载县的第一位进士，其对于万载族谱的编纂产生的重要影响，到了清末已经为地域社会诸士绅效仿的典范。

3. 商人的兴起。类似于李荣陞这样的地方士绅的影响力，较多的还是局限于礼仪和文献方面。但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商人的势力已经越来越凸显。高村李氏在乾隆后期开始的危机，正是与经济发展带来的商业繁荣有关。借助乾嘉时期大量新兴的市镇，商人团体也逐渐进入了地域社会的权力格局。

^①李荣陞：《贺兄弟得买凤凰洲》，光绪谱，曾卷《家集·廷荐公》，第4页。

^②饶继光：《文峰记》，同治《饶氏族谱》。

^③《冷水坑案纪略》，光绪谱，元卷《公据》。

^④参见拙文《祠堂、宗族与地域社会》第2章第4节，南开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

^⑤民国三十五年（1946）《万载辛氏幼房谱》，卷尾《历届谱序书后及跋》。

4. 清中叶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镇的兴起,也为清初以来进入的移民群体提供了良好的契机。这些闽粤移民不仅在经济上获得了发展,也积极参与到地域社会的书院建设、宗族建构乃至科举竞争中。

5. 李荣陞的宗族教化实践,依据的主要是乾隆初年陈宏谋在江西推行的多项教化措施,而且这一现象在万载邻境的醴陵等地也颇为流行。这种教化实践的结果,如修谱格言、谱论等等,一直都出现在此后万载各姓族谱中,充分体现了国家力量在地方社会的影响力。

(原载饶伟新主编《族谱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45—170页。)